

唐顺宗永贞年间,以王叔文、王伾为首的官僚集团,联合刘禹锡、柳宗元等等士人发起永贞革新。改革持续百余天后失败,王叔文被贬赐死,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,史称“二王八司马”。

柳宗元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,在赴任途中,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。生活在永州的10年间,他游历山水,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,写下了著名的《永州

八记》。

刘禹锡则被贬往朗州(今湖南常德),并在那待了近十年。其间,刘禹锡创作了大量寓言诗,由于接触当地民间歌谣并从中汲取灵感,他的诗歌创作表现出不少新的特点。

刘禹锡是河南荥阳人,祖籍洛阳。初到湖南,人生地不熟,这位“诗豪”是如何认识湖南的?

河南人刘禹锡,来湖南第一件事是干啥



文/任瑾洛

过去论及地方官员推崇方志的案例,以昌黎先生韩愈和紫阳先生朱熹的事迹提及较多。

韩愈过南岭将至韶州,先写诗寄刺史借图经;朱熹知南康军,下轿先问当地图经。黎锦熙在《方志今议》(“次广四用”节下“旅游指导”目),就提到这两个案例^①。黎氏原文称朱熹问《南康军志》,查阅大量文献目录资料,并无《南康军志》一书。结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收录的《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稟事件状》等文章,以及诗歌《入南康界阅图经感陶公李渤刘凝之事戏作》的记载来看,确认朱熹所看的是图经无疑,所谓“下轿伊始问志书”,是后人将图经加工为志书。

所以,韩愈和朱熹实际上查阅的文献都是图经。当然今天多数学者都认为,图经是方志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态和别称,属于广义方志范畴。但在韩愈和朱熹的认识中,图经是否属于方志呢?这就需要先从刘禹锡到任后翻阅方志的故事说起。

刘禹锡初到朗州,看的是啥书

永贞元年(805),刘禹锡因参与“永贞革新”失败,被贬连州刺史的赴任途中,改贬为朗州司马。司马是州刺史的副职,到唐代中后期,逐渐演变为无实权的闲职,专门用于安置被贬谪的官员或闲散人员。刘禹锡是出了名的嘴硬、脾气硬,被贬湖南以后并未消沉,结合当地民歌民风创作了许多作品。

他到任朗州之初,就对照方志的记载,与当地入交互印证。然后,他发现朗州的山水风物已经被之前的很多诗人骚客咏叹过(应当是歌咏作品都收录在方志中),于是他就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也作成一首长诗《武陵书怀五十韵》。“五十韵”即五十韵五言排律,唐人的排律多用整数,如十韵、二十韵、三十韵、四十韵、五十韵等,五十韵共100句。诗文的前半部分参考方志“横排门类”的体例,记述了朗州的历史沿革、民俗生计、田园风光、人文遗迹、气候物产等,展现了唐代湖北地区地域风貌。

需要注意的是,他在《武陵书怀五十韵》诗前序中提到:永贞元年,余始以尚书员外郎出补连山守,道贬为是郡司马。至则以方志所载,而质诸其人民,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,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。^②

他清清楚楚自述,“至则以方志所载,而质诸其人民”。那么,刘禹锡到朗州以后查阅的方志究竟是什么图书呢?

按照已知的唐代书目分析,刘禹锡在朗州查阅的方志很有可能是以图经为主。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《麓山精舍丛书》等文献辑佚的唐代方志中,就有《朗州图经》,但并无朗州志或朗州地志。唐代以“志”为名的地方文献是较为罕见的,多数地方文献以“图经”为名。据陈运溶、张国淦等人辑佚考证,唐代时今湖南地区内编纂有《长沙图经》《衡州图经》《邵阳图经》《岳州图经》《朗州图经》《澧州图经》《道州图经》《茶陵图经》《衡山图经》《湘阴图经》等。考察历史文献记载,当时应

当还有更多图经。刘禹锡自述的方志,大概率就是图经类文献的统称。这在刘禹锡的作品中也能得到验证。

刘禹锡作品中提到方志仅此一处,而提及图经这类地方文献则次数较多。如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中前序云:至则考图经,参见事为之诗,俟采之夜讽者。^③

前序“至则”征诸方志,此篇“至则”考索图经,措辞如出一辙,足以证明下车伊始则披图质野、参稽风物,是刘禹锡每至一地的惯常行事,也可以有力佐证刘禹锡所称的方志,可能即图经类文献。

同样在朗州创作,描绘武陵地区五月端午于沅江举行龙舟竞渡的《竞渡曲》小序云:竞渡始于武陵,及今举楫而相和之,其音咸呼云“何在!”斯招屈之义。事见图经。^④

前文已知《武陵书怀五十韵》是以方志所载,质诸人民,具所见闻成诗,五十韵这首诗前半部分明显是仿照方志的体例在创作。诗文中又有“桀叶慰忠魂”“湘灵悲鼓瑟”两句,这些关于屈原的内容应当就是“方志”中有所记载。此处,《竞渡曲》又称武陵地区的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,并说具体情况在图经里有记载。这也可以从侧面印证,刘禹锡所称的方志,可能即图经类文献。

又《夔州刺史厅壁》记文中称:故相国安阳公乾曜尝参军事,修图经,言风俗甚备。^⑤这一句仅能说明刘禹锡确有所了解一地图经的习惯,在夔州同样有所牵涉。

而收录在外集中,在连州所作《和杨侍郎初至郴州纪事题郡斋八韵》的“城头鹤立处,驿树凤栖来”一句的注释中提到了图经。苏耽传云:后化为仙鹤,止城东北隅楼上。又州北栖凤岭。图经云:常有威凤降于寒梧也。^⑥

此注释可能系宋代宋敏求辑补时所作,此处带过不予讨论。

中晚唐官员,把方志当旅游手册?

结合韩愈的诗文“愿借图经将入界,每逢佳处便开看”,可见唐人就已充分认识到方志、图经这类地方文献具有较好的旅游指导作用。中晚唐时期,官员普遍对方志的作用有所认识,相关记载很多。帝王以及宰相、三公之类的高官都通晓方志、重视方志,我所作的《论魏晋隋唐时期“方志”观念共识和方志文献的关系》曾经对此做过详细论述,此处只稍加证明。如权德舆《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并序》开篇感叹,“通天下之志者,在大君元臣之感会而已”。^⑦唐代还有韦乾度到任朗州时的作品中也提到过考察方志。

韦乾度(生卒年不详),京兆杜陵人,其子韦琮为宰相。元和十二年(817),韦乾度在朗州任职时,在《桃源观石坛记》也提到:验方志,秦人获天爵之所;稽近圣,元宗皇帝树火枣之乡。^⑧

文中提到武陵郡(原文误作“铜陵郡”)的自然风光,有“深流有沅湘七泽”之句,岑仲勉在《读全唐文札记》已经对此文进行过考证,唐世无铜陵郡之称,断定此桃源即今湖南桃源县。元宗皇帝即唐玄宗,此处应当是清代官员为避康熙“玄烨”讳所改。这两个朗州任职官员的案例说明,唐代地方官员到任以后,翻阅方志已经是很常见的现象。

或许正是浸润于中晚唐朝野上下重视方志、推崇图经的普遍风气,刘禹锡才养成了这般“下轿伊始问志书”的癖好,也将案头文献与山水民情,融为了其贬谪生涯中独特的风景。

注释

- ① 黎锦熙 白云鹏,《方志学两种》,岳麓出版社,1984年1月,第24页。
- ② (唐)刘禹锡 撰,《刘梦得文集》文集卷第三《律诗》,四部丛刊景宋本,第5页。
- ③ (唐)刘禹锡 撰,《刘梦得文集》外集卷第八《律诗》,四部丛刊景宋本,第14页。
- ④ (唐)刘禹锡 撰,《刘梦得文集》文集卷第八《乐府》,四部丛刊景宋本,第4页。
- ⑤ (唐)刘禹锡 撰,《刘梦得文集》文集卷第二十七《记》,四部丛刊景宋本,第1页。
- ⑥ (唐)刘禹锡 撰,《刘梦得文集》外集卷第五《杂诗》,四部丛刊景宋本,第8页。
- ⑦ (唐)权德舆 撰,(民国)姜殿扬 校补,《权载之文集》卷第十一《碑》,四部丛刊景清嘉庆本,第3页。
- ⑧ (清)董浩 辑,《全唐文》卷七百二十四《韦乾度》,嘉庆十九年武英殿刊本,第12页。